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汪林茂
编

汪康年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14018819

B25
30
V11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汪林茂
编

汪康年卷



B25
30
V11



北航

C170514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汪康年卷/汪林茂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300-18555-2

I. ①中… II. ①汪…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②汪康年 (1860~1911)-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9607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汪康年卷

汪林茂 编

Wangkangnian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张	36.2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70 000	定 价	8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当代学者之所以熟悉汪康年，或者说汪康年之所以会成为当代学者研究的一个中心人物，起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了一部《汪康年师友书札》。的确，这部书札很能说明汪康年的历史地位——思想并不那么前沿，政治上也不是居于一线，也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大事的汪康年，却凭借他的报人职业和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把那些在思想上或政治上都比自己高大的（当然也有比自己稍矮小的）人物都结纳于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历史人物群体的网络，也使自己成为居于晚清思想和政治漩涡中心的一颗明星。因而汪康年的著作本身尽管思想闪光点并不多，但这些平实而勤勉记录的著作，却是他当年伴随变动不居的思想、政治潮流，及时而勤勉地对思想界和政治界的变动加以记录或评点、广泛地与思想界和政治界各种人物进行交流与摩擦的忠实记录。因而汪康年也就成为当代学人了解或研究那个时代思想、政治、文化的一个难以绕过不顾的历史人物。

汪康年，初名灏年，字梁卿；后改名康年，字穰卿，中年自号毅伯、毅白、初官、醒醉生，晚年号恢伯。这一连串不同时代所取的名、字、号，决不是没有意义的。

杭州汪氏是从徽州移居来的经商致富的大家族，但自汪康年祖父一代开始，家境就每况愈下。到1860年1月25日汪康年出生时，其父亲基本上没有从上一代那里继承到什么家产，只能依靠八品微职微薄且时断时续的俸禄，艰难地维持全家的生计。而且生逢乱世，幼年的汪康年不得不随父在浙、赣、粤间奔波，一面在其父亲的督导下读书。因此在这个时期，汪康年及其家人最期望的是“丰年穰穰”、“降福穰穰”，摆脱贫困的家境。

1882年，汪康年父亲病逝，作为长子的他不得不早早挑起养家的

重担，先后在杭州任书局分校、王文韶姐姐家坐馆，同时继续学业。他的勤奋学习，换来命运的转机：继 1886 年入钱塘县学后，1889 年考取八旗官学教习，同年秋中举人，1892 年成进士。1890 年，他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招，到武昌为其孙子教读。继而又充任两湖书院的史学斋分教，在湖北志局参与省志的编校工作。1893 年湖北自强学堂正式成立，受张之洞之命任编辑，翻译西学书籍。在湖北的六年时间里，汪康年不仅得以拜在权臣张之洞的门下而得到帮扶，并积累了人脉，积累了政治经验，也积累了西学素养，奠定了他日后办报论政、开展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基础。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汪康年对国家的内忧外患状况越来越担忧，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越来越关心。

1895 年中国对日战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分界线，也是汪康年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1895 年后，汪康年离开湖北到上海，列名上海强学会，参与创办《时务报》，积极从事变法活动，开始了报人、政论活动家、政治改革鼓吹者的人生历程。他也为自己人生道路的这一转折点树了一个标志——为自己取新号“毅伯”、“醒醉生”。确实，这个时代的国家、民族，亟需汪康年这一代人走出蒙昧，坚毅救国；志在爱国、强国的汪康年也决然为变法救国而做启蒙宣传，而坚毅前行。

在这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汪康年也的确在为实现他的政治改革追求而坚毅行进。在戊戌维新时期，他主持《时务报》，并且亲自操笔撰文，为变法运动的开展而鼓吹呐喊，也积极参加各项改革活动，如参与发起组织学会、创办新学堂、译印西学书籍等。戊戌变法被镇压，但他没有改变通过改革以救国的努力方向，一面通过他所主持的《中外日报》等报刊继续鼓吹变法，一面参加了组织自立会和中国议会的活动，力图通过争取东南各省督抚的支持，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联邦国家。至自立会和中国议会也被镇压，汪康年仍然寄望于清政府的自改革，因而一面极力劝告国人不要躁进而要耐心等待，一面继续推动政府实行真正的改革。但结果却是越来越令汪康年失望、担忧、丧气：一面是国民的“躁进”而失去耐心，一面是政府的拖沓欺骗。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汪康年改号“恢伯”。

无论这是恢复的“恢”还是谐音的“灰”，我们从中体味出的是一种消极、保守的意味——当然，这更是后人根据事实所做的一种推断。1907 年以后，汪康年逐渐丧失了此前曾有过的一点积极进取、冲破旧秩序的勇气和力量，更多的是一种坚守旧秩序的暮气，以及面对社会潮

流涌进的张皇。他不仅斥责革命是“祸患”，一些要求缩短立宪预备期的立宪派也被他指责为“喧哗之徒”，责备废约保路爱国运动是不顾“大局”，指斥那些批评清政府的报刊是“侮慢”、“轻藐”、“言论之过其界限”，甚至清政府进行的法制改革也被他责难为太激进。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且迅速向全国各省蔓延，旧王朝、旧秩序即将垮塌，忧心如焚的汪康年撑持病体为朝廷最后一次尽忠，提出了“以收拾人心为第一要务”的建言，但已无济于事。11月3日汪康年逝世。三个多月后，汪康年真诚维护的清王朝宣告退位。

汪康年在他的52年生涯中，16年办报，创办并主持的报刊有6家，期间还为这些报刊撰写了大量的论说之文；又善于交友，多以书信与友朋讨论国家局势和政治，交流信息和情感，或向当政者建言献策。汪康年病逝后，其弟汪诒年辑录了他发表于报刊上的部分文章，以及所留下的文稿、书信底稿等，先后编辑成《汪穰卿遗著》（八卷，1920年铅印）、《汪穰卿先生遗文》（上、中、下三卷，附《汪穰卿先生传记》七卷，民国间铅印）、《汪穰卿笔记》（八卷，1926年版）三种。可以确信，《遗著》、《遗文》所收录的只是汪康年作品的一个部分。本书编者以《遗著》、《遗文》为底本，翻阅了汪康年创办和主持的报刊^①，也调查了已知的汪康年存世的书信等作品，拾遗补缺，共得420余篇。按照汪康年论著的内容，本书分为六个部分（七篇）：

第一部分“变法篇”，是汪康年阐发其政治改革思想的文章。通过政治改革来救国、强国，是汪康年自甲午以后坚持不变的追求。但这十多年的政治改革追求是一个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汪康年的变法思想实际上还是有具体变化的。

汪康年明确提出政治改革思想是在甲午以后，本书的“变法篇（上）”所收录的就是这一时期汪康年的文章。最能够代表他在这一时期思想锋芒的，是1896年9月《时务报》第四册上的《中国自强策》（上、中、下），其中大胆提出了以兴民权、设议院为纲，以改革政府机构，遍设学堂、报馆、巡捕（警察），以及招商以平道路、浚江河、开

^① 汪诒年在《汪穰卿遗著》卷首目录后做说明：“《中外日报》中先兄所为论说颇多，于时事尤有关系，然曩昔报章通例，率不署撰著人姓字，故何篇为先兄所撰，颇未能确知，不得已谨从盖缺。《京报》之论说亦不署名，幸溧阳汪君仲卓始终其事，于论说之著作人尚能一一识别，故据以缀辑。汪君之厚谊不敢忘也。《言报》文字皆先兄一人所撰，无他人之作属入其间，几于悉数编入，是以卷帙独多。”故《遗著》、《遗文》中收录的汪康年文章，以辑自《言报》的居多，其次是《时务报》和《京报》，经营时间最长的《中外日报》反而缺失。

铁轨、通电报、制银币、立银行、正税则等改革措施为内容的变法自强策，认为“如此行之十年，国以富，兵以强”；以及在第九册发表的《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主张“复民权、崇公理”，以“与西人相角”。三年期间，汪康年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十余篇对改革运动及与当时局势“皆极有关系”、“对于朝野上下苦口危言，日以救亡图存之策相劝告”（汪诒年评语）的文章，起了很大的变法宣传作用。从这些文章看，戊戌时期汪康年的改革思想颇有魄力，颇有雄心大志。

“变法篇（下）”所收录的则是1900年以后汪康年在自己创办并主持的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书信。在这一时期汪康年所要求的仍然是变法——政治改革，但与戊戌时期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

一是在戊戌时期，汪康年虽然也是寄希望于统治者的自改革，但戊戌时期更多的是敦促，是要求，而1900年以后更多的是强调依赖和等待——从策划自立会试图依赖地方督抚的支持，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联邦国家；到提出《整理政法纲要》，试图依赖日本与其他西方国家支持光绪执掌政权，而后“将国家之事重行整顿”；到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一味要求“薄海臣民”以“实事求是之心”静静等待，反对“喧哗躁进”，主张“不应冀其进行之过骤”。

二是提出变法主张更为具体。在戊戌时期，汪康年变法主张的表达，更侧重于理论阐述，更多的是像《中国自强策》、《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这样的宏篇高论；1900年以后，汪康年的变法主张更侧重于一些具体的改革举措，更多的是如《整理政法纲要》一样的建言改官制、清户口、厘正赋税、整饬财政、兴利源、兴教化、通达道路、改正刑狱、讲求外交之法；像《上政府说帖》一样建议扶助华人自行传教、处置赫德、处置盛氏、整饬税务、铸金币、招华商办理国内商务、招求海外人才、慎用外人、慎重商约、用人宜慎等等的变法方案。在报纸上发表的，多是围绕发辫该不该剪，服色应不应当更易，刑律应当怎么改，军国民教育可不可实行，以及臣民应如何配合改革等等之类规范变法行动的说教。

第二部分“报人篇”。作为近代中国较早的民间报人之一，汪康年创办或主持的报刊先后有六家。在这个过程中，汪康年始终是以报人作为自己唯一的职业身份。所以，他既不同于传统的“文人论政”，而是以大众传媒为讨论和评说政治的论坛。同时也不同于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政治家报人，始终是以民间报人的立场，坚持独立办报，不屈从于

外国势力和满清政府的压制。他也不仅仅是利用报刊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途径，他对如何办报有自己的思想——新闻思想。也就是说，汪康年是在一定的思想观点的指导下办报的。这部分所收录的50余篇文章，正体现了汪康年的新闻思想。

汪康年对报刊地位和作用有自己的认识。他在《论设立〈时务日报〉宗旨》中说，报刊的重要性首先是“能通消息，联气类，宣上德，达下情，内之情形暴之外，外之情形告之内。在事者得诉艰苦于人，僻处之士，不出户庭而知全球之事。”公开、迅速和普及的特点，沟通信息、传播新闻的作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同时，报刊可以发挥动员全国之人起来救国的作用。在中国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历史背景下，“欲作民气，振民心，定民志，必在于崇清议。清议于何宣之？必宣之报。是则报也者，固振聩发聋之要品也”。他还在《京报》上专刊《论报章之监督》一文，指出报刊还有一个应负的社会责任，即监督政府。汪康年认为：“报章者，所以监督政府，而谋社会之公益者也。故于政府之得失，社会之利害，或誉扬而赞成之，或防维而纠正之，报章之职分宜然也”。并且也使官与民上下沟通：“使官之所为，民无不知之。民有所苦，官无不知之。”即上情下传，下情上达。

政治的良性发展、社会各群体之间的互相沟通都离不开报刊，所以他主张政府应当放开对报刊的限制。他在《论粤督限制报馆》、《论报馆挂洋牌之不可》、《论朝廷宜激励国民多设报馆于京师》、《〈通报〉停闭感言》等文中，批评政府的舆论压制政策，指出同治以来，中国人办的报刊虽不少，但“于时事多未敢深论，论之或辄致殃咎”，原因在于政府不能容纳批评意见，这实际上是政府“自欲斩刈新机，歼划国脉”。因为这不仅是政府“自示畏缩，且适表明政府必无容直言、奖气节之美德”，而且必将导致官与民离，民“则永与政府相抗相隔……上下新旧满汉之间，相离亦益愈甚”。他一再呼吁政府给予报刊自由发言之权利，以“力纠政府之过失”，也以“监督社会”。他多次上书当道，要求尽快制订报律，使民间开设报馆合法化，从法律上保障民间报馆的生存权利，也以法律规范报刊的行为，以为中国报刊争取一个较好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

汪康年更为重视的是报刊自身的建设。他在《论报章记事关系个人及社会之分别》等文中，认为办报者及报刊要有“报识”和“报德”。所谓“报识”，主要是指报人的新闻敏感，能及时反映民众呼声、时代

潮流、社会和政治动向，否则就是丢掉了“报识”。但他更强调“报德”，认为报德是报刊的生存基础，因为报刊的一大使命是监督政府、监督社会，这就更要报人自身讲求道德。而且报刊是“代表舆论之机关也。既为舆论之代表，则其一言一语，皆将为社会所信仰。夫以社会所信仰，而不自保其名誉，自尊其资格，自重其价值，而信笔书之，率意言之，人将不信仰我”。所以他经常强调报刊的报道或评论“必有根据”，不应该捏造或夸大事实，“以骇人听闻、并不确实之消息布散于社会”；（《针报》（十三））同时也要敢于说真话，例如对于政府及官员的“失德”之事，“报章万不能不为纠正”（《论报章记事关系个人及社会之分别》），更要公正不偏，切不可“挟偏私”，决不可“以讦发人过恶，指摘人瑕疵为天职”，而应当从是否“有碍大局，或妨于社会”着眼。立论应出于公心，至少不应有偏见。即使有党见，“其措词亦应有一定之规则，而事实尤须有着落”，否则，“此报乃成为一文不值之报”（《敬告》（二四））。

值得注意的是，汪康年对报刊地位及职责的定位，侧重点是有变化的。从他对当时报刊的评论中可以看出，1900年以前，汪康年更强调报刊对政府的新闻监督，以及报刊的言论自由；而在此以后，他从原来的立场后退了。他在此期间发表的至少二十余篇《针报》、《规报》、《说报》一类文章，重点不再强调报纸要监督政府，更多的是要求报刊“谨言慎行”，对当时报纸揭露或批评清政府的黑暗腐败、昏庸无能，或是指为“捏造”、“随意诬诋”，或是斥为“侮慢”、“轻藐”，或者指责为“弛漫放纵”、“言论之过其界限”。

但不管怎么说，汪康年对中国近代报刊建设方面是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他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第三部分是“外务篇”。外交，在近代中国是一件大事，汪康年作为一位爱国的报人，必然地会借助报刊，表达自己对中外关系、对国家各项主权的得失、对国家面临外部形势的关注，并且在如何应对外来危机方面向政府提建议，向社会发警言。

从这部分收录的七十余篇文字可以看到，甲午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几乎每次中外交涉重要事件，汪康年都会通过报刊发表自己的看法，或通过书信向当局提建议——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汪康年在谴责德国的强横无理的同时，更呼吁“当国之人，茹痛如此，其必尽改旧辙，聿新百度”。1901年发生了俄国欲霸占我国东北的事件，汪康年

发起抗俄集会，并上书当局，要求与俄力争。葡萄牙欲借澳门划界谈判之机，以威胁要挟手段扩张领地，汪康年写信给清政府，主张对葡人的意外要挟，“仍应坚持不许，万一不允，宁与失和”。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等地渗透扩张，汪康年始终保持警惕，并常在报纸上发文予以揭露，并向政府发出警告。还要看到，汪康年在这一时期的《中外日报》、《京报》等报刊发表的言论中，内容最多的是揭示中国所面临的外来威胁，以及催促政府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号召国人奋起救国。如《京报》上刊登的《书越南人巢南子海外血书后》、《论高丽告中国》、《再论高丽告中国》、《三论高丽告中国》等文，以越南、高丽亡国的事实，指出：“今日之世界，强权世界也……吾中国当今之时，处今之世，犹沉酣于睡梦中乎？”其《论偷安为贫弱之原因》、《日法协约之深意警告政府》等文，则向政府发出警言：“各国皆以保全东亚和平为主义，盖其目的在平和瓜分”，切不可“淡漠视之”。批评清政府“束缚其己国之人民，受无数强大国人民之奴视，竭尽其己国人民之膏血，以供无数强大国政府之牺牲”。也向民众发出了团结救亡的呼吁，劝告清政府尽快“施行改革”以强国。

但汪康年关于外交方面的思想主张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至于变化的动因，汪康年在1911年的《敬告》一文中是这样说的：中国外交“将由敷衍对付时代，而入于卤莽灭裂时代”。所谓“敷衍对付”，即办外交者“无识见，无方法，见事办事，而于当时之利害，则尚知之也”，这就需要舆论从旁推进；而“卤莽灭裂”则是这样一种情况：“自近年以来，排外之说日甚，而举全国社会，皆不研求方法，而惟以极端强硬为可贵，于是已失之权利，日谋收回，藉故要求之事，概以拒绝为贵，社会中几几以此为外交官之殿最，而利害不问也。此等大病，无人起而大声疾呼以救正之……万一于不宜强硬之事，而忽为强硬之态度，则陷吾国于悲境矣。”

当民众反侵略斗争真的兴起并高涨时，汪康年却又忧心忡忡了，担当起了“疾呼以救正之”的角色。在外交方针上，他提出应以“审慎为之体，争执为之用”。认为“处弱国而言外交，不能不出于对付，势也，无可讳言者也。若羞此而鲁莽焉、横裂焉，则大祸立至，可必矣”。所以面对20世纪初年中国各界民众要求收回各项主权（如租界、海关、邮政、航路等主权、废除领事裁判权、自争界务等）的斗争轰轰烈烈开展时，汪康年即在报纸上发表了《论租界与领事裁判权》、《说外交》、

《评外交》、《外交感言》、《醒吃》、《诘问》等文章，或是辩解称中国的关税、邮政等主权并没有被外国人夺占，“惟初通商时，无人能经理，因托外人为之”。或是反对民间对交涉之事妄加干涉，认为遇有关涉外人之事，“必须由国家所命之外交官与外人交涉，若贸然由一人或一小部分径与外人交涉，必无此体式，不特为外人笑而已，且使外人知我无尊重国权之心”。甚至主张对那些虽“己之为直，人之为曲”的交涉事件，与其动辄抗争，“无宁含糊过去”。这与1897年汪康年在《论胶州被占事》中表达的“惟新创之后，正宜竭力自张，以示不测。且民惟无用，用则上下张奋，九败犹冀一胜；不用则气日馁，心日弛，必日割以至于亡。是则必战之故，一言可决”的坚决抵抗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四部分是“铁路篇”。铁路在20世纪初已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事，更是一个搅起冲天大潮的政治问题。它引起了各阶层中国人的关注并置身其中，汪康年也不例外。

从这一部分所收录的最前面的《致吴佩葱先生书》和《呈商部文》看，汪康年并不赞成与外国人合办铁路。事实上，当浙江铁路问题刚被提上议事日程时，汪康年曾经是自办浙路的赞成者、浙路公司的发起人之一。1905年，汪康年作为京官四代表之一，与在沪的浙江士绅一起策划并成立了浙路公司。但由于此后的事态变化，一方面是汪康年的堂兄汪大燮成为浙江保路废约风潮的对立面，另一方面是（和汪康年外交方面的主张一样）是，面对汹涌激昂的群众性保路废约风潮，他认为有必要“疾呼以救正之”，所以这部分的三十余篇文章，从《醒吃》、《儆告》、《悲言》、《诘问》、《纠谬》、《宜知》、《记怪》、《砭论》、《痛言》等等之类的题目便可以看出，大部分是对保路废约运动的批评。这些批评多集中于这三个方面：

一是宣扬借款筑路无害。汪康年认为拒借洋款毫无道理，所谓借款路亡、路亡国亡之说更是危言耸听。认为借款筑路不比开矿、办实业，是有害有益的，关键在于如何使用款项，“假使吾国善自为谋，绸缪谨慎，虽借款无害也。若夫上下相猜，政法错乱，虽路矿尺寸不假手外人，而一旦祸发，则一切将全入外人之手”。而且借款筑路，若干年后铁路完全归我，因而“无害”，“何所为路亡国亡者？”

二是为清政府“铁路干路收为国有”决策辩护。他认为，“铁路之干路收为国有，质言之，则是将各省民办铁路之局面，全行改变，而另